



春風化雨

——千年经典解读

陈鸿仪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春风化雨：千年经典解读 / 陈鸿仪著. --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2012.11
ISBN 978-7-226-04375-2

I. ①春… II. ①陈… III. ①中国文学 - 古典文学
- 文学欣赏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 258345 号

责任编辑：牟克杰

封面设计：王国鹏

春风化雨：千年经典解读

陈鸿仪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甘肃北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8.5 字数 333 千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600

ISBN 978-7-226-04375-2 定价：38.00 元

序 言

我的同窗好友陈鸿仪先生毕业于西北师大汉语言文学专业,于中国古典文学及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毕业后就教于靖远师范,从事语文教学工作26年来,在教学之余有志于学术研究,广泛浏览各种书籍报刊,锲而不舍,笔耕不辍,将自己多年来撰写的文学随笔及读书札记,细心修改,分类编纂后,于2009年、2010年先后出版发行了文史鉴赏集《数风流人物》和《润物细无声》。我忙里偷闲,翻阅了这两部书,觉得颇有趣味。书中所涉猎的知识领域极其广阔,政治宗教,文学哲学,诗词曲赋,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人文掌故,涉及甚广,探究细致,思考深邃,议论精当,叙写明了,于丰富材料的编纂和生动语言的表达中融入了知识性和趣味性,呈现了他的文思才华,在博览群书和广泛搜集中将高远眼光和真知灼见熔为一炉,传达出他的远见卓识。一个中等师范学校的语文教师,能有如此之学养和识见,也足见其功力精深。

文史鉴赏是一种激起情感波涛的阅读活动,同时也是一种懂得出入之法的审美过程。清末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中指出,作者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这表明文史鉴赏要懂得出入法。首先要入乎其内,是说鉴赏者要置身于作品中,使鉴赏者与作品融为一体,进入作品境界,使读者的心潮与文章的波澜同起伏,使读者的感情与文中的人物共悲欢,进入作者的内心,揣摩作者的用心,领会作者的匠心,并身受感动,陶醉其中,这是一切鉴赏活动的基础。不能潜心的入乎其内,没有真诚的喜爱,就不可能产生鉴赏的激情。其次要出乎其外,就是置身事外,冷静地加以旁观,通过突破作者语言传达的限制,挖掘出文章的外在意蕴,在对作品意蕴作充分领悟的基础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更何况鉴赏的目的是为了成就自我人生,而鉴赏的结果是作品陶冶了读者的心灵,其间可能会有多种收益,

而审美的收益则是最根本的。读者通过自觉的鉴赏活动,透过语言的中介及其感染力,以心会心,与作者进行感情上的沟通交流,使人生获得新的颖悟,让生命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因此,鉴赏活动不仅是一种娱乐过程,更是个体不断觉醒、生命不断提升和拓展的过程。鸿仪先生在注重积累、广阅博览中提高了文化素养,培养了鉴赏能力,同时,也在阅读中兴会感发,获得了贴切的领悟,并行诸文字,完成了他的文史随笔《数风流人物》和《润物细无声》。

时隔两年的2012年,他又将自己撰写的20篇文学随笔加以整理后,编纂成册,题名为《春风化雨—千年经典解读》,并将此书初稿遥寄于我,要我为其写一篇序言,盛情难却。我于匆忙中阅读了他的《春风化雨—千年经典解读》初稿,颇觉其文字思想更加深厚,不论是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诸如《给“学而优则仕下一注脚”》、《“谬解”爱情与婚姻》等篇目,都有其独到的见解,还是对文化问题的探索,诸如《长城神话已经坍塌》、《音乐与人生》、《吹遍九州的东南西北风》、《碎片历史点滴思考》、《沐浴天使的光辉接受民主的洗礼》等,都有其深刻的反思。他对唐诗宋词的酷爱以及对中国历史的钟情,对一些历史人物和古典诗词的解读,更是不同凡响,有着不同寻常的领悟和深邃细腻的思考。尤其是他在《刘邦的无赖与智慧》、《帝王中的艺术家赵佶》、《由历史上的四位贪官所想到的》、《董其昌其人其事》等文中,通过对刘邦、赵佶、元载、蔡京、严嵩、董其昌、和珅等历史人物的解读,我们从中窥见他对历史的一些生动描述和理性思考,其见识更是卓尔不群。作为鉴赏性的文字,他不只是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客观的罗列,而且还表现出了足够认识和思索,并站在现实的立场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作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道德伦理评价,为读者提供了历史借鉴。在他看来,王朝的兴替,基本上遵循着一个没有多少新内容的规律,兴盛时,谁都以为自己的基业是不朽的,于是忘了打一剂预防衰败的免疫针。衰落时,统治者基本不从主观上找原因,而是进行最后的疯狂,破罐子破摔。因此,忠良的高风亮节在纸上被笔墨记住了,奸邪的卑劣行径却在生活中仍然延续着,特别是对照今天的现实,竟然发现某些存放了几千年的糟粕依然大有市场,某些血的教训仍在教训今人,某些曾经不断翻车的轨道,仍有大量的人在奔走。更有甚者,某些事情今人做得比古人更狠更绝,所谓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他的解读,感情激烈,语言犀利,观点鲜明,文字流畅,见地不凡,具备了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和警世价值。从政有年,于所学专业多有生疏,尤其对于严肃

的学术问题,更是不可轻易造次。挚友恳请,僧面难拂,只好潦潦草草,胡乱涂抹几句,不知可否达其心意。

鸿仪先生教书育人,读书著文,堪称书业有专攻,几年之间写成三部专著,成果不谓不辉煌。但他为人谦谨,不喜张扬,总能保持高调做事低调做人的一贯本色。他淡泊名利,不慕虚荣,只是在平常的生活中坚守自我,在默默无闻中悄然自重,这样的做事精神和为人品格令人敬佩。对他所取得的辉煌成果作为老同学我在此深表恭贺,并预祝他在今后的学术研究及文学创作中,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言长纸短,不能尽意,了了数语,略表寸心,斯为序言。

张 应 华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目 录

苏轼的人生情结	
——读《前赤壁赋》所想到的	(1)
泪眼问花花不语	
——欧阳修及其诗文	(13)
一身去国六千里	
——走近柳宗元	(29)
上马击狂胡 下马草军书	
——爱国主义诗人陆游	(42)
醉里挑灯看剑	
——抗金英雄辛弃疾	(59)
问渠哪得清如许	
——南宋理学家朱熹	(75)
吹遍九州的东南西北风	(89)
音乐与人生	(108)
一支不老的歌——雪	(121)
“谬解”爱情与婚姻	(133)
给“学而优则仕”下一注脚	(149)
长城神话已经坍塌	(164)
沐浴天使的光辉 接受民主的洗礼	
——从道德教化走向民主政治	(173)

碎片历史 点滴思考	(200)
董其昌其人其事	(218)
刘邦的无赖与智慧	(224)
帝王中的艺术家赵佶	(235)
由历史上的四位贪官所想到的	(243)
一片芦苇的断想	(280)
寂静的人生	(282)

苏轼的人生情结

——读《前赤壁赋》所想到的

一、缘诗讽谏大师受挫

宋神宗熙宁九年,王安石变法受挫,变法方向发生逆转,一些投机新法的钻营分子,开始结党营私,倾轧报复,耿直敢言的苏轼成了官僚们政治倾轧的牺牲品,苏轼由徐州调往湖州。神宗元丰二年(1079)四月,苏东坡到达湖州担任知州。可是,他到湖州后屁股还没有坐热,就在当年的七月二十八日突然遭遇逮捕,其罪证主要被指控为他的一些诗文有讽刺新法的嫌疑。原来,在苏轼的诗文中曾流露过一些不满情绪,表示过对新法的一些不同见解以及针砭新法流弊的言论,其目的无非是“缘诗文之义,托事以讽谏”,这对于学术思想比较活跃、政治气氛相对宽松的宋代来说应该不算什么。可是,文化群小们为了达到栽赃陷害的不可告人目的,硬说苏轼在许多诗文中流露了对政府及皇帝的强烈不满和极大不敬,方法是对他的诗文中的一些词句和话语进行上纲上线的推断与诠释,甚至不遗余力、苦口婆心的一款一款分析给皇帝听。这些毁谤诬陷、攻击中伤中潜藏着一个神秘元素,那就是要命的妒忌。所以弹劾者在写给神宗皇帝的检举信中说苏轼“衔怨怀怒,恣行丑诋”“指斥乘舆,包藏祸心”“无人臣之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如此等等,罗列了一系列罪状。

一切诬陷者都喜欢把自己打扮成某种“险恶用心”的发现者,事实恰恰相反,他们不是发现者而是制造者,他们常常串通一气,合成一体,肆无忌惮地去干伤天害理之事。当他们四处寻找蹂躏践踏的对象时,把射击的目标对准了苏轼。因为他们总是喜欢把自己中伤的靶子锁定在一个目标比较大的人物身上,而苏轼的不幸是他拥有的社会地位和文坛声望使他无法也不可能躲开这群小人的视线,于是,他们在朝廷上告发了苏轼,并派人将苏轼从湖州押解京都开封候审。据宋人笔记记载,这一天,京都开封的来人气势汹汹,令苏轼本人惶恐万

状,有些不知所措。当然,对于飞来之祸,内心再淡定的人也难以做出理性的反应,气质再高雅的群体也很难设计出从容的表情。一时间,亲友惊散,家人震恐。余秋雨先生在他的《苏东坡突围》一文中有一段描写生动而心情沉痛的文字不妨引来:“从湖州到汴京,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位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把诸多文化大师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都是一群挤眉弄眼的小人。”苏轼在狱中受尽了屈辱和折磨,有时甚至令他感到难免一死,所以他曾在狱中写了两首诗与弟弟苏辙诀别,其中有“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的诗句。幸亏亲友多方营救,尤其苏辙、仁宗皇后(神宗的祖母),以及当时担任宰相的吴充等人从中说情斡旋,才于当年十二月结案出狱。

苏东坡为什么会遭遇如此众多的文化群小的围攻和伤害?当我们平心静气的思考,不难发现,就是因为他的名字太响亮,他的才华太出众,他的人格魅力太耀眼,把周围比得太暗淡,太寒碜,令他们无法承受了。连苏东坡自己也深深意识到,由于自己的不成熟和才华的外露,才给自己造成这样多的麻烦。所以,我常常想,一个人想要平庸,很少有人阻拦他,一个人想要出众,很少有人不阻拦他,不少平庸者与周围的人际关系非常融洽,不少出众者与周围的人际关系非常紧张,这就是平庸与出众的差异。古人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任何才华的外露和追求轰动效应的做法都是缺少自知之明之举,任何炫耀和张扬表现出来的都是肤浅和无知,恰恰相反,低调和内敛永远是沉稳和尊贵的表征。许多艳羡的目光里深藏着觊觎心态,许多溢美之词中往往包藏祸心,面对诸如此类的阴谋和机心,成熟的做法是:低调做人,悄然自重。

我记得史料上有这样一段记载,由于苏轼一生的许多灾难都是因为他做诗惹起的事端,也就是说贯穿苏轼一生的都是诗祸。所以亲朋故旧都劝他尽量少做诗或者不要做诗,在他离开京都去杭州赴任时,83岁的老诗人文彦博特地赶来为他送行,临行前语重心长地劝告苏轼,到了杭州不要乱写诗,免得惹祸。苏轼很能理解老前辈的一番良苦用心,他心理明白,他和他的诗文成了满朝文武大臣注意的焦点,尤其那一群挤眉弄眼的小人,更是把射击的目标对准了自己,用极其阴郁的目光盯着他的诗文,抱着极度险恶的用心对他的诗文进行篇篇扫描,句句留神,时刻准备为它们下注解。到了杭州,苏轼没有忘记老诗人文彦博那一番语重心长的嘱咐,一段时间里他确实没有写诗。当然,不写诗,不等于没有诗化的生活,杭州本身就是一首诗,在这里,他尽情享受生活的美,用自己的

性灵去拥抱和体验生活中的诗情。这是人生的一种大放达,一种与自然和谐共处、坦诚对话的大自在。人在诗中,诗在胸中,是否见诸笔墨,传唱闾巷并不重要。但他终究无法控制自己蓬勃的激情,更何况生活在充满诗情画意的杭州,最终,他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的诗篇,其中广为流传的就是那首歌吟咏西子湖的《饮湖上初晴后雨》:

水光潋滟晴偏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我们来看这首诗,它的前两句是说西湖在晴日里,阳光明媚,碧波荡漾,景色异常美好。细雨中,湖泊周围的山头上,雾气升腾,聚散变幻,景观更是奇异美妙。后两句把西湖比作古代美女西施,说它正如那仪态大方的美人西子一样,无论是浓妆打扮,还是淡妆自然,都恰到好处。以美人喻美景,新奇巧妙而又极富诗意。诗人利用想象中西施之美,来为西湖增色,所以西湖从此就得了“西子湖”的美名。

诗文使苏东坡成为中华艺术天空中那灿烂群星中最耀眼的一颗,诗文也曾给他带来了一系列摆脱不去的麻烦,以至朝廷将他投进大狱,半年来让他受尽百般屈辱,吃尽牢狱之苦。老天总算在苏轼孤苦无望的时刻打开了一扇窗户,朋友和亲属的多方营救和说情,终于打动了神宗,神宗下诏将他释放。

二、贬谪黄州寄情山水

苏轼获得释放后,以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的名义被贬谪到黄州,被贬黄州是苏轼政治生涯中的一个低谷,却也是他精神历程中的一次升华。黄州这样一个闭塞的环境反而成就了一颗伟大的心灵。1080年春季,苏轼赴黄州就任。他的政治处境非常艰难,生活水准也大不如前,以致这位名满天下的大文豪必须通过躬耕垄亩,才可以收获全家的口粮。即便倒霉到这步天地,苏东坡仍旧未改其一贯诙谐幽默的性情,常常是兴之所至,编出一个个笑话或故事,以助亲人朋友苦中作乐,也算是含泪的微笑。

1082年秋冬,苏轼先后两次游览了黄州附近的赤壁,面对滚滚东逝的长江之水,回想多变的世事,宦海的沉浮,诗人不禁感慨万千。他把对历史的感悟以及对人生的体验都凝聚在了对赤壁古战场的凭吊中,发出了响彻千古的天籁妙音,两篇流传千年的名赋,即前后《赤壁赋》便产生了。苏轼所游的是黄州的赤鼻

矶,并非当年周瑜大战曹操的赤壁,据学者们考察发现,周瑜大战曹操的赤壁在湖北的嘉鱼县,而非黄州赤壁,但作者并不深究历史的真实,只是借题发挥抒发自己在黄州时期的怀抱感慨。艺术本来追求的只是审美,不一定要顾及它的真实与否。今天我们学习苏轼的词赋,是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苏轼的情怀,而不是他所歌吟的赤壁是对是错。大艺术家即便错,也会错出魅力来,正如王尔德说的,在艺术上只有美丑而无所谓对错。生活就是这样的让人不可捉摸:端正的人格被骂得一文不值,流落远方;而错误的赤壁却居然能错出千古绝唱,华夏名胜。

任何一个人的生命轨迹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他的哲学思考和审美判断。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其丰富。他22岁中进士,进入仕途后他奋发有为,励志图强。由于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并注重政策的实效性,他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斥打击。他被外放时勤于政事,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两座。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然而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他44岁时遭遇“乌台诗案”,险遭不测。晚年更被一贬再贬,直到荒远的海南,食芋饮水,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

在苏轼的一生中,曾遭遇过三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第三次是62岁时从惠州贬至儋州,直到65岁才遇赦北归,前后在贬所六年。但对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起来的。苏轼被贬至惠州、儋州时,已是饱经忧患的垂暮之人,但创作激情仍未衰退,而且在艺术上进入了精深华妙的新境界。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与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在宋代就有人认为贬至海南并不是苏轼的不幸,逆境是时代对这位文学天才的玉成。因此,许多文人之所以在自己的不幸遭遇和生活苦难中,能够显现出人性的光辉,并创建文明,这是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他们外部身份和遭遇可以一变再变,但内心的高贵却在苦难的磨砺中生发出灿烂的灵光,这就像有的人不管如何追赶潮流或身居高位,却总是掩盖不住内心的卑贱一样。他们凭借这种内心的高贵,可以在生死存亡的边缘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他们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顾物欲利益,不顾功利得失,义无反顾,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高贵者确实是愚蠢的,而聪明的恰恰是那些卑贱者。

黄州时期是苏轼创作中的一个高峰,他的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都完成于此时。到了黄州的苏轼,并没有多少公干,朝廷没有给他安排具体的工作,可能他的这个团练副使只是朝廷专门为被贬犯官们设置的一个职位,到了职任后,仍然接受其他地方官员的监督。无事可干的苏轼为了排遣内心的苦闷,他除了礼佛参禅,就去游赏大自然。佛道思想的影响、天地灵气的启迪与对历史人物的深思,使苏轼逐渐走出心灵的阴霾。而其重要的标志,就是这篇震烁古今的名篇——《赤壁赋》。

《赤壁赋》是苏轼人生的一个分水岭,是苏轼思想成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由于仕途坎坷,屡遭贬谪,人到中年的苏轼,流落黄州,他在黄州的生活是非常艰辛的,这种艰辛不光体现在物质上的匮乏贫穷,更体现在精神上的孤独无告。这种艰辛使他彻底洗去了生命的铅华和生活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于是对话也一定变得异乎寻常。而优美的诗文正是他对艰辛生活的挣扎和超越。他与好友同乡道人杨世昌两游赤壁,享受夜景,极目渺渺苍穹,感慨人生短促,多少壮志随风消逝,多少期许转头成空,他不仅没有失意沮丧,反以豁达胸怀写成前后《赤壁赋》,来排解胸中苦闷,重寻人生快乐之源。

《赤壁赋》是一篇借景抒情的散文小赋,它将情与景巧妙地加以融合,使景物描写充满了诗情画意。江面上,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诗人与同伴饮酒诵诗,明月从东山山头冉冉升起,并徘徊在斗宿和牛宿之间。他们所驾的一叶扁舟浮在茫茫江面,此时此刻,月色、水光与天宇合成一体,以至于江动还是船移,御风还是乘云,令诗人迷茫而无所知。面对迷人的景色,作者忘情地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人世间的一切烦恼、个人的所有不幸都一下子被抛于脑后,他进入到一种飘飘欲仙的陶醉状态,感觉身轻得像要离开尘世飘然飞翔,有如道家羽化成仙一般。

而苏轼的人生态度,是其性情的自然流露,他纵情山水,礼侍禅宗,知道生命只是某种东西刹那之间的表现,只是永恒精神在刹那之间留存于躯壳之中的形式,他很不愿意接受人生是重担、是苦难的说法,只是希望享受人生的每一刻光阴。所以,在他看来,人生不过百年而已,历史上不知有多少人痴心妄想,追求长生不老,但最终都成泡影。所以,在苏轼看来,人生的那一刹那,只要你能很好地珍视它,也就美好可喜了。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但他的精神是永不磨灭的,在后辈中,如天空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闪亮照明,可以滋润营养,因而维持众生万物。这样看来,夜游赤壁纯属士大夫的及时行乐了。然而,苏轼由于宦海沉浮,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其丰富,他很善于从人生的不幸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

客观事物的认识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观中都蕴涵着深刻的哲理。比如他的《题西林壁》诗: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写寻常人物观山赏景时由于横侧远近的角度和距离不同,自然会产生不同的感受,引发出无限的联想。这首诗正是从看山中悟出哲理的,又把哲理通过看山的感受告诉人们,情景和哲理融成了一体,两者构成比喻,耐人寻味。在这样的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信念和不向恶势力屈服的斗争精神,所以苏轼在逆境中的诗作依然是笔势飞腾,辞采壮丽,纵意所如,触手成春。

当然,任何景物的描写都是为抒情服务,因为景是情的外观,情由景生,情是景的内涵,写景是为了抒情。美妙地自然景观给人们提供了审美的可能,而文人墨客将深厚的历史意蕴、深刻的人生体验深情地注入自然景观中时,大大地提升了自然景观的文化浓度。旅行在外,无论是登山观景还是乘船下海,常常在俯仰之间就有了气势,有了伟大和渺小的比照,有了视觉空间的移位,也因此上就有了观赏和冥想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客观景物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审美的可能,文化层次的不同是游客在这种审美可能中获得不同程度的实现。

苏轼以自己的精神力量 and 人格魅力给黄州的自然景物注入了丰厚的文化意蕴,而正是这种文化意蕴使黄州无生命的自然形式变成了人们审美关照的对象。毫无疑问,苏轼不仅是黄州自然美的发现者,也是黄州自然美的确定者和构建者。反过来自然对人也进行了构建和确定。苏轼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轼,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的有趣关系。回过头来我们在看《赤壁赋》文本,苏轼在这篇文赋中描绘的主要景物是“风”“月”,是秋江的清风,是澄清的星空,在月移船行中飘飘欲仙,而正当词人与同伴陶然其中,感受欢乐之时,箫声响起。这“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箫声,其实正是苏轼心迹的折射。作者忘情于月夜秋江,但并没有忘身。在苏轼“扣舷而歌”的喜悦背后隐藏着一抹哀愁——一个不被重用反遭迫害的落魄文人的幽怨,这种幽怨之情在他同一时期的词作《卜算子·黄州定

惠院寓居作》中得到同样的反映,原词是这样的: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惟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这首词写在一个“月挂疏桐”、夜深人静之时,心事浩茫的诗人在孤独寂寞中独来独往,仿佛缥缈若仙的孤鸿之影。可是孤鸿遭遇不幸,心怀幽恨,惊恐不已,拣尽寒枝不肯栖息,只好落宿于寂寞荒冷的沙洲。从而表达了作者贬谪黄州时期的孤寂处境和高洁自许、不愿随波逐流的心境。乌台诗案以后,由于命运的倏忽变幻,使他更加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困苦和命运的变幻莫测,所以他不止一次地浩叹“人生如梦”。所谓“人生如梦”,既指的是人生的有限短暂和命运的虚幻易变,也指命运如梦般的难以把握,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诗文意境的哲理意蕴。

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没有因此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人生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这些都集中地体现在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上。他月夜泛舟赤壁之下,借着客人的箫声,奏响了自己的一腔哀婉凄切的心曲,“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如潜蛟舞于幽壑,如嫠妇泣于孤舟,这是怎样的悲哀和幽怨?此情此景,令作者思接千载,浮想联翩,从眼前的赤壁,联想到三国的曹操,其用意颇深。一世之雄的曹操舳舻千里,横槊赋诗,何等气魄;雄姿英发、指挥若定,少年得志的周郎何等风流。“而今安在哉”的发问,一下子使诗人苏轼的精神空间提升到一个超迈古今、独步天下的辽阔境界:伟大与渺小原是一回事。执迷也罢,超脱也罢,出将入相也罢,打鱼砍柴也罢,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不过是短暂的一瞬。既然非凡的事业都将转头成空,横空的人物终成匆匆过客,人还有必要去执念一物,何不去啸傲山水、纵情酒歌?人事如此,造化亦然。和曹操这样强悍的英雄相比,自己不过是一个江中小洲上捕鱼打柴的渔父樵夫,不论是身份还是功业,可谓是天壤之别。转而又抱恨于人生须臾,江山无穷,登仙乏术的无可奈何。苏轼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仿佛只是一个寄生在天地之间的尘埃而已。字里行间宣泄着作者政治上失意的苦闷,表达着人生无常的叹息,同时也表现了作者意欲超脱现实、回归自然的情怀。而实质却是其心理变化的一个转折——消极的思想深处正在酝酿着“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内心骚动。只是这“飞仙”与“明月”并非什么“求仙隐逸”,而是文人早年“忠君报国、经世济时”的理想。“知不可乎骤得”,苏轼此时才恍然明白,当年进谏神宗皇帝所说的“欲速则不达”正印证在了自己的

身上,同时也流露出了词人消极的人生观和虚无主义思想,而这种消极的人生观和虚无主义思想终将落入传统文化中的宿命追求。

宿命追求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种传世情结,在人生的目标和意义渺茫而找不到答案时,在生命的走向令我们无法解释它的因果关系时,只有把它归于宿命追求。千百年来,由于人们在对宇宙人生做处置时,把人类社会同宇宙自然对立起来,又把个体的人同社会整体加以分割,自然看不到全部历史舞台上威武雄壮剧的持续演出,也看不到人类虽然依赖自然但更有改造自然的能动性和创造力,这就是悲观厌世或消极出世思想的认识论根源。对于封建社会的文人士大夫来说,当他们政治失意或生活上遇到挫折的时候,往往就会陷入这样的苦闷与迷惘中,苏轼也是如此。他在《谢量移汝州表》中说:“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縲绁之中。憔悴非人,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可见当人生的秋霜寒露呼啸而至时,苏轼对于苦难并非麻木不仁,对于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的目的。这种执著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涵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生命力。

在这篇散文中,苏轼拾取眼前景物,从地面上的江水和天空里的月亮说起,“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意思是江水不舍昼夜地滔滔流去,作为某一段江水,确实从这里消失了,而作为整个江水,则始终长流不绝,因此可以说“未尝往也”。关于月亮,苏轼认为“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意思是月亮有时圆满,有时缺损,但它缺了之后又复圆,这样周而复始,终究无所增减,因此可以说“卒莫消长也”。列举江水、明月,说明去留、增减的辩证关系,从而归纳出一般的认识原理:“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就是说,变与不变,无论宇宙还是人生,都是相对的。如果从“变”的角度来看,岂但人生百年,顷刻即逝,就是向来认定的天长地久,其实也是连一眨眼的工夫都不曾保持常态;如果从不变的角度来看,则宇宙万物固然无穷无尽,其实人生也一样绵延不息。因此,对人生而言,那天地宇宙万事万物,“而又何羡乎”?自然也不必“哀吾生之须臾”了。

“变”与“不变”反映了作者的相对主义理论和“物各有主”的观念,这是全文的主旨所在,这其中虽然有作者纵情山水、与世无争的消极思想,但更主要的是一种旷达,一种洒脱,一种理智和超然,这实在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人们常说,人

生不如意者常十八九,尽人事而顺自然,这实在是一种大彻悟、大智慧。苏轼这种宇宙观和人生观包含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作者不同意看问题绝对化,注意到事物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但不能认为是科学的,因为作者沿袭了庄子的相对主义观点,而相对主义否认衡量事物的客观标准,抹杀事物质与量的实际界限。同时,苏轼这种宇宙观和人生观固然表现了他对政治迫害的蔑视,对于所追求的理想的坚持,身处逆境依然那么豁达、开朗、乐观、自信,但也表现了他随缘自适、随遇而安、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往往包含着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以及从流连光景中寻求精神寄托。所以他在“而又何羨乎”一句之后,掉转笔锋写道:“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苏轼认为,人对自然万物,非但不必因“吾生之须臾”而羡慕其“无穷”,反倒要使“无穷”的自然万物为“吾生”所享用,从中得到乐趣。“江上之清风”有声,“山间之明月”有色,江山无尽,天地无私,风月长存,声色俱美,他正可以徘徊其间而自得其乐。

三、智慧幽默热爱生活

不论环境多么恶劣,不论遭遇多么不幸,作为一个不失赤子之心的乐天派苏轼,永远对生活保持着热度,当我们走进苏东坡的人生轨迹时,我们同样不难发现,苏东坡对生活充满了热爱,他的生活本身充满了诗意,也饱含了无尽的情趣和无限的活力,他把感官生活和精神生活一而二,二而一,诗歌与哲学是并行不悖的,他喜爱哲学但他更喜爱诗歌和人生,致使他不能通过苦修去做和尚。又由于他喜爱哲学,他的智慧之高,使他不会沉溺于生活而不能自拔。作为诗人的他,不能忘情酒和女人,因为酒和女人最具文化灵性,也最容易激发诗人活跃的情绪。所以他不能忘情于酒和女人犹如他不能忘情于青山绿水一样。有这样一个故事很能说明他的调皮和淘气,苏轼有一个当和尚的朋友叫大通禅师,大通禅师是一个持法严谨、道行高尚的老僧。据说谁要到他的修行处见他,必须首先依法斋戒,女人当然不能进他的禅堂。有一天,苏轼和一群人去逛庙,其中有一妓女,因为知道那位高僧的习惯,大家就止步在禅堂外面。一种幽默和诙谐感在苏轼的意念中油然而生,也正是在调皮和淘气的冲动下,让他做出了让大家难以想象的举动,他坦然地领着那个妓女走进了大通禅师的禅堂。老和尚见苏东坡如此荒唐,心中不悦。苏东坡向老僧请示道:如果老方丈肯把诵经时用来敲木鱼的棒槌借给妓女一用,他立刻吟诗一首以谢罪,禅师答应了。于是苏东坡作了

一首小调让那个妓女唱来：

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棒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愁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

大通禅师听了呵呵大笑不止。因为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和尚与女人之间的艳闻，远远要比商人与女人以及士人与女人之间的艳闻透彻精彩得多了。

还有，在苏轼担任杭州通判时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他曾判决了一个与和尚有关的案子。灵隐寺有一个和尚叫了然，他常到青楼歌馆去寻花问柳，迷上了一个叫秀奴的妓女。两人来来往往，时间一长，了然有些痴迷难舍，但当他钱财花尽，弄得衣衫褴褛的时候，秀奴便再也不愿见他了。一夜，了然喝醉了酒，又去青楼上见秀奴，却吃了闭门羹，了然顿时怒火中烧，恶生胆边，闯了进去，把秀奴干脆杀掉了事。和尚因谋杀伏法，查看和尚的身体时，从他的胳膊上发现刺有一副对联：

但愿同生极乐园，免如今世苦相思。

苏轼笑着结案，判词也是一个小调：

这个秃驴，修行忒煞，云山山顶空持戒。只因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毒手伤心，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安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

苏轼曾细心地研究过佛教，对禅宗笃信不疑，在如何将禅宗用于立身处世这一点上，他也得到了踏踏实实的好处，他能通过哲学的深思，把生活中的愁苦化解为一种具有历史深度的感悟。坎坷的遭遇，不仅砥砺了他坚强的意志，也铸就了他刚健的人格，使他的人生得到了历练。这样，他就能从有限的时空中跳出来，在更高的层面上求得心理平衡。这种心理的平衡反映在他对庸常生活采取智慧幽默的态度上，有一则关于苏轼的小故事，说的是汉字中的“鸟”，这个字有两个读音，也有两个意思。一个读音是“niǎo”，指天空的飞禽，还有一个读音是“diǎo”，多用在民间俚语中，意思颇为不雅。如《水浒传》中的“鸟男女”等。有一天苏东坡想开佛印（苏东坡好友，是一位和尚）的玩笑。苏东坡说：“古代的诗人太聪明了，做诗时常常将‘僧’与‘鸟’两个字在诗中相对，举例说吧：时闻啄木鸟，疑是叩门僧。还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我佩服古人以僧对鸟的智慧。”佛印说：“这也就是我为何常常以僧的身份与你相对而坐的理由。”